

甘扬道和战地国际援华医疗队

□ 于海龙

介绍，甘扬道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再次提出要去解放区工作的想法，他说，“我们绕过大半个地球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就是为了到第一线参加反法西斯战斗，为什么要去后方呢？”周恩来对甘扬道这种不畏艰险的人道主义精神十分动容，但出于抗战全局的综合考量，周恩来说服了甘扬道继续留在国统区的救护总队工作。

当时中国抗战前线的生活异常艰苦，甘扬道在几十年后回忆，他们当时挤在破旧仓库中休息，睡梦中只要感觉身上有东西在动，就立刻起来抖掉，以防止鼻子或耳朵被老鼠咬伤。而甘扬道所处的工作条件更为艰苦，那时没有病房、没有手术设备、没有足够的医护人员，每个医疗小组仅有一名医生，也很难找到合适的翻译。特别是要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到前线救治伤员，如果遇上沿途公路被破坏而使车辆难以行进时，甘扬道则带领医护人员肩挑马驮，带着沉重的医疗器械辗转各地。即便如此，甘扬道也始终积极自信，保持着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革命热情。甘扬道刻苦学习中文，学会了有湖南口音的中国话，打破了语言造成的隔阂，加强了与中国战士的沟通交流。甘扬道在医治伤员与老百姓的同时，还亲自编写教材、培训医护人员、制造医疗设备、研制药品、训练战场担架队、搭建简易战地医院、向军民宣传卫生知识，创造性地改善了当地医疗卫生环境。他用竹子搭建简易太阳能淋浴槽，让士兵享受到温水浴，再将他们脱下来的衣服塞进架在烧开水锅上的大木桶里，以此来达到杀灭细菌的效果，极大改善了伤员的生活质量，为减少非战斗减员、提高战士士气起到重要作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甘扬道逐渐喜欢上了中国文化，他喜欢吃臭豆腐、饺子等传统中国美食，也喜欢听京戏，甚至还可以做中国菜、唱中国歌。更为难得的是，甘扬道与前来图云关报效祖国的燕京大学护理系学生张荪芬相识相爱，志同道合的他们在1942年喜结连理。虽然甘扬道夫妇当时的新房只不过是借来的草棚，但他们“一点也不觉得苦”。甘扬道夫妇生有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保中”“保华”，寓意为“保中友好，保卫中华”，从中亦可见甘扬道对中国人民与革命的浓烈热爱之情，并希望将这份热情与光辉历程传承给后代。

保加利亚的中国“宣传员”

1945年，中国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甘扬道便回到了保加利亚，1946年被任命为普列文军区主任医师并获得保加利亚“共和国勋章”；20世纪50年代，转去索非亚医学院担任教授。但甘扬道对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支持的热情并未因其回国而衰退，他回国后仍然十分关心、宣传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他经常通过作报告介绍中国。同时，张荪芬则在索非亚大学教中文，亲自编纂了第一部保中双语字典。甘扬道夫妇的这些举动为保加利亚人民更深入了解中国、支持中国革命奠定重要民意基础，为中保人文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甘扬道虽然身在保加利亚，但他对中国始终念念不忘，在中国有他割舍不掉的革命情谊。抗战胜利后，甘扬道曾多次访问中国。甘扬道夫妇在1983年应邀访问中国。访华期间，他将自己珍藏40余年的数百张珍贵照片捐献给自己，这些照片记录了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与援华医疗人员的无私奉献精神，这是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甘扬道还特意到访延安，他说：“我终于来到了延安，40多年前的愿望实现了。”1989年11月，甘扬道夫妇再次访华，他去了阔别多年的贵州图云关，追忆那段难忘的岁月。甘扬道对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欣慰不已，对中国的明天充满信心。

中国人民对甘扬道为中国革命的贡献始终怀着感谢之情。1996年10月，甘扬道出席了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在北京举办的“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国际纵队成立60周年纪念会”活动，与会者高度赞扬了援华医生支持中国抗战的崇高义举。2004年6月，国际援华医疗队最后一位外籍医生甘扬道与世长辞，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在甘扬道的葬礼上，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亲自前往吊唁，感谢这位帮助过中国的有着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外国友人。



1939年，甘扬道、贝尔、杨固和富华德（从左到右）从英国利物浦启程来华时在船上的合影

“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提出

□ 罗建波 孔志国

“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是周恩来总理在访问亚非国家时提出来的，它奠定了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基础，充分彰显了新中国外交的国际主义精神。这八项原则包含着中国开展同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的真诚愿望，为中国赢得了亚非拉朋友的真诚友谊和坚定支持。

（一）

1963年12月14日至翌年3月，周恩来总理率团对亚非欧14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其中包括10个非洲国家，即北非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西非的加纳、马里、几内亚，东非的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以及3个亚洲国家，即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以及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这是中国继1955年亚非会议后对亚非国家的又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向世界展现了中国重视发展与广大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以及积极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定决心。1964年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加纳时系统阐述了中国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时严格遵守的八项原则，即“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这八项原则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五，援助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

物资；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时，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第八，中国援外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在遭受长期的殖民统治之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开始纷纷追求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共产党高举国际主义旗帜，把广大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反殖斗争看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自身极为困难的时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成为亚非民族解放运动最重要的外部支持力量之一。据统计，1971—1975年间，中国援外支出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5.88%，1973年一度高达6.92%。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对外援助最具标志性的重大工程，这条长达1860公里的跨国铁路有力支援了南部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奠定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友好关系的基础。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曾这样称赞道，“中国一贯积极地、实际地支持非洲为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取得彻底的解放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斗争”。他还说，“中国也是一个不发达国家，贵国给我们的援助是世界上最发展中国家之间团结一致的例证”。

在那一时期，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也是中国外交的迫切需要。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同时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封锁和包围，中国外部环境变得异常艰难。中国执行了最广泛的反帝反霸外交路线，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中国国际一线战线的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先后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大手笔地勾勒出国际矛盾斗争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在国际力量分化组合中清晰指出了敌我友的关

系，为中国找到了尽可能多的国际支持力量。第三世界联合反帝反殖反霸的历史成就是显著的。一大批亚非国家相继获得政治独立，延续几个世纪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中国也借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在美苏包围封锁下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在它们的帮助下成功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主席在获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指出，这一重大胜利“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在中国看来，通过支援亚非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建设，能够极大地履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义务，也可以动员尽可能多的国际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极大配合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斗争，体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周恩来曾对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吻合做过阐释：我国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进行建设，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支援未独立的国家取得独立；支援新独立的国家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巩固自己的独立，增强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力量。我们对兄弟国家和新独立国家进行援助，把他们的力量加强了，反过来就是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对我们也是巨大的支援。

（三）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是中国对外援助的政治基础。八项原则提出，中国始终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始终坚持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在对外援助时谋求任何特权，这是中国对外援助的最大特色。中国一直把发展中国家视为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在开展对外援助时注重倾听对方的意见和主张，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与他们同甘共苦、携手前行。八项原则明确承诺，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

为何长颈鹿会和麒麟混为一谈？

□ 李萝卜

像是几种动物的杂糅。

到了汉代，麒麟屡见于史，频繁出现。麒麟又简称麟，汉武帝元狩元年来去郊祀时就发现了一只被称为麟的异兽，后来发现这不过是只并角的小鹿，可能因为基因突变两只角长在一起了。麒麟的其他特征时有变化，唯有独角的形象一直很固定。

汉代画像石上，麟有着肉球一样的独角，身体四肢和马、鹿的形象比较接近。徐州贾汪出土的汉画像石上，麒麟形态各异，身高颈长，肤有纹彩，头顶肉角。到了魏晋南北朝，麒麟形象受到了印度、波斯等外来文化的影响，独角且面如狮子，身如壮牛，尾有鳞片，脚下生火，和狮子等大型动物形象更为接近。

南北朝时期麒麟的独角形象有些许变化，独角开始勾曲翻卷。唐代的麒麟特征更鲜明，它们四肢健壮，独角曲线强劲有力。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常会在各类地方志里看到谁家牛产了一个遍体鳞甲的麒麟神兽的记载。宋明以来的麒麟都是长着鳞片，这和以前大为不同，说明人们对于麒麟外观的认知一直在变化。

长颈鹿如何与麒麟联系在一起

有人认为麒麟是传说中的动物，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麒麟有原型，是獐、牛或印度犀牛等。在宋代以前，人们还很少把长颈鹿和麒麟联系在一起，因为200多万年前，由于气候的变化，长颈鹿的生活范围已经缩小到

非洲和南欧，在中国基本见不到长颈鹿。所以，当人们初次见到长颈鹿这种怪异的动物时，把它当作麒麟也是可以理解的。

宋朝以前人们对长颈鹿很陌生，关于它的最早记载或是出自宋代李石的《续博物志》，里面说到有一种动物叫“拔犛力”，生长在今东非索马里的柏培拉国。这种异兽的皮如豹子，长着像牛一样的蹄子，脖子长九尺，身高一丈有余，名唤犛牛。

麒麟开始以一种活生生的动物形象出现在中国人面前，大概要到明朝永乐年间了。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一个叫榜葛刺国的小国（今孟加拉国地区），因为新国王刚登基，就向中原王朝进献了一头长颈鹿，引起朝野上下的轰动。百官对此很好奇，但谁也不知道这种动物到底是什么，有人称它“锦麟”，也有人叫它“金兽”，最后有人证明，这就是传说中的麒麟。

说起把长颈鹿当作麒麟的过程，也颇为曲折。长颈鹿有个番名叫“祖刺法”（阿拉伯语zaraafa的音译），“祖刺法”也指阿丹国，这个小国家在地理志典籍中也叫徂蜡，徂蜡的索马里语又叫“Giri”。七拐八拐到这个地方，让聪明的大臣们看到了一个顶级拍马屁的机会，“Giri”和中文“麒麟”的发音不是很像吗？于是，从此以后长颈鹿就变成了麒麟。

听到这个中文译名，明成祖朱棣非常高兴，毕竟在古人看来只有时逢盛世，明君在位，才会有麒麟这种瑞兽降临。这恰合朱棣的心思，于是命令画师画“麒麟图”，并附上沈度的《瑞应麒麟颂》。还有一幅《榜葛刺进麒麟图》摹本，

中国援外人员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的平等、谦虚、友善、勤劳的精神和品格，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赞誉。

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是中国对外援助的根本目的。八项原则明确指出，中国对外援助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对外援助既着眼解决受援国的一时之困、暂时之危，更着眼培育、提升它们的内生发展动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发展援助”和“民生援助”。中国希望推动伙伴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它们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联合培养技术人才，破解它们面临的基础设施滞后、资金不足、人才短缺的瓶颈。在当前全球抗疫背景下，中国通过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缓解受疫情影响的经济和民生困难，同时帮助部分国家建立疾控中心等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向它们提供更多防疫和疫苗技术支持，帮助它们提高公共卫生能力。

坚持力所能及、重信守诺，是中国对外援助始终坚持的优良传统。中国曾携手亚非国家反殖反帝反霸斗争，在它们实现民族解放后则携手追求发展与复兴。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计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名援助人员，700多人为他国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已先后7次宣布无条件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政府无息贷款债务。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在推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减贫、实施人道救助、推进公共卫生合作等领域承担了应有的大国责任，以实际行动彰显了自身不断提升的国际道义精神。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画中的长颈鹿栩栩如生，一眼就能识别。在南京徐达五世孙的墓里出土了一件官服，上面的麒麟补子也显然是只长颈鹿，长颈鹿就是麒麟这件事在明朝已经达成共识。

揭开长颈鹿的神秘面纱

明末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带来了大量异域知识。清代，在传教士南怀仁的《坤輿全图》里长颈鹿又叫恶那西约，不过这一称号直到清末也未能流行。同治七年（1868年），总理衙门章京志刚，随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出访伦敦，在“万兽园”里见到一种叫“支列胡”（英文giraffe的音译）的动物，形状像鹿，吻垂如驼，身高仅五六尺，脖子却有身长的两倍，这无疑就是长颈鹿。

晚清长颈鹿的译名很丰富，叫它“直猎狐”“高脚鹿”，当然也有称“长颈鹿”的。在晚清张德彝所编的《稿本航海述奇汇编》中，提到万牲园有一种动物，就叫“直猎狐”，又名“奇拉甫”。随着动物知识的传播，还有人绘制百兽图，向大众科普长颈鹿的来源和生理结构等知识。到了近现代，人们已经能够识别长颈鹿，逐渐地把长颈鹿和麒麟区别开来，文章开头说的那种混淆两者的认知，后来就越来越少了。

